

学习与参考

目 录

党政之声

- 习近平强调：始终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发挥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主力军作用，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时代强音 (2)
- 习近平强调：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3)
- 习近平强调：弘扬万隆精神 加强亚非合作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4)
- 习近平强调：两岸关系处于新的重要节点上
绝不让台海和平得而复失 (4)

理论之光

- 解放区战场是抗战“中流砥柱” 徐 焰 (5)
- 民主重要，治理更重要 杨光斌 (6)
- 学习“四个全面”中的战略思维 戴 旭 (7)
- 毛泽东与中国道路 陈 晋 (8)
- 理想信念的坚定与哲学话语权 侯惠勤 (9)
- 中华美学精神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丁振海 (9)
- 维护移动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宋丽丹 (10)
- 警惕雷人台词背后的反历史、去历史化倾向 王新荣 (11)

党的建设

- 从严治党也得“敢啃硬骨头” 周锦尉 (11)

时事热点

- 万隆精神的新时代内涵 陈须隆 (13)
- 8个“关键词”读懂上海司法体制改革 (15)

名词解释

-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悬浮剧”等5条 (16)

习近平强调：始终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 发挥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主力军作用， 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时代强音

在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始终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汇聚强大正能量。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全社会都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看不起普通劳动者，都不能贪图不劳而获的生活。

要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

好群众工作，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雪中送炭，纾难解困，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

我国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不论时代怎样变迁，不论社会怎样变化，我们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都不能忘记、不能淡化，我国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动摇、不容忽视。

习近平强调：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也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他强调，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

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实力 and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具备了支撑城乡发展一体化物质技术条件，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还指出，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是一项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重大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顶层设计，加强系统谋划，加强体制机制创新，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力争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逐步实现高水平的城乡发展一体化。

习近平强调：

弘扬万隆精神 加强亚非合作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表示各国应该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加强亚非合作，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

习近平就弘扬万隆精神提出3点倡议：

第一，深化亚非合作。面对新机

遇新挑战，亚非国家要坚持安危与共、守望相助，把握机遇、共迎挑战，继续做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第二，拓展南南合作。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应该抱团取暖、扶携前行。

第三，推进南北合作。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要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在不附加政治条件基础上，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缩小南北差距。

习近平强调：

两岸关系处于新的重要节点上 绝不让台海和平得而复失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朱立伦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时强调：

两岸关系处于新的重要节点上。两岸关系路应该如何走，是摆在两岸

所有政党和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攸关中华民族和国家未来，攸关亿万民众福祉，需要我们大家认真思考。国共两党应该加强交流、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擘画两党关系发展

新前景，共同开创两岸关系未来、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提出5点主张：

第一，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其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第二，深化两岸利益融合，共创两岸互利双赢，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宗旨；

第三，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灵沟通；

第四，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着眼大局，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不仅要求同存异，更应努力聚同化异，不断增进政治互信；

第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大家一起来干。

解放区战场是抗战“中流砥柱”

徐 焰

中国将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举行阅兵式的消息，加热了有关国共两党抗战贡献的讨论。国内舆论场长期有一种声音，竭力赞颂国民党正面战场，贬低甚至抹黑解放区战场，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亵渎。一是各党派、各支军队和广大民众都对抗战做出了贡献。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起坚持了14年，1937年以后又由局部抗战发展到全面抗战，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战时间最久，国内参加抗战的各党派、各支军队和广大民众都做出了贡献。不过仔细而论，当日军侵占东北而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时，中国共产党在沈阳沦陷第二天就在全中国各党派中最早发出武装抗日的号召，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正式对日宣战。1935年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翌

年通过西安事变得以停止内战形成一致抗日的共识。若无中共方面这些努力，南京政府还在“先安内再攘外”而内战不息，哪里会有全民族共同抗战？又何谈抗战胜利？在全国抗日战场上，共产党领导解放区战场物质条件最困难。国民党虽丧失半壁江山还毕竟是全国性政权，保持400万以上军队，得到过20亿美元的外援包括大量武器。抗战之初共产党只有5万多人军队（八路军4.5万人，新四军1万人），武器只有少量枪支，几乎没有火炮，此后又一直得不到外援而要靠战场缴获来获取装备。在只有“小米加步枪”的简陋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本钱打大规模正规战，除了“百团大战”这样少有的集中作战外，正确的指导方针便是发动群众打分散的游击战。二是游击战是一种高超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当局当年污蔑

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游而不击”和“坐大”，此说根本违背了战争基本规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开创根据地后，日军自然感到后方受威胁，长期以在关内的约半数兵力进行“治安战”，并以其特有毒辣实行了“铁壁合围，纵横扫荡”等战术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后解放区通过粉碎一次次“扫荡”，才能形成发展——缩小——再壮大的局面。事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近些年一些人对正面战场上的22次会战津津乐道，对共产党的游击战则持轻视态度。八路军、新四军在最艰苦的时期军民一体打游击，华北敌后200余县提出的任务是一个县一天打死一个鬼子，每月便能毙日军6000人。对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持久战的方针，习惯于正规战的许多人曾不理解，却能在抗战中积小胜为大

胜，将日军拖得疲惫不堪。三是两党抗战表现决定人心向背。解放区战场越战越强，最后发展到100万军队和1亿人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侵华日军的后方变成又一个前线，名副其实是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若是没有这些奋斗，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逆流就会更加泛滥，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就很难继续坚持下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八年全面抗战中能坚持下来，正面战场广大官兵也曾对日寇浴血奋战，对此中国人民一直给予肯定。不过国民党政权在抗战中后期表现日益消极，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采取保存实力等待胜利，这又是当年国内舆论纷纷谴责的事实。正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表现决定了人心向背，抗战结束四年后中华大地上便出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政权更换，当年中国人民的这种政治选择也是对抗战史的最好诠释。

（摘自《环球时报》）

民主重要，治理更重要

杨光斌

民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国家治理。为此，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当然包括现代性政治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民主问责、权力有限、大众参与、自由、市场与法

治等，但这些形式的现代化说到底要通过治理能力来实现，否则发达的政治形式只是治理的羁绊，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要求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必须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强国家能力。因此，用学术语言来概括，中国的改革要以“有能力的有限政府”

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就意味着，未来改革即到2020年的取向是：国家有能力、权力有边界、权力受约束。需要指出的是，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其实就意味着权力的人民性和治理

主体的人民性，权力有边界和权力受约束就意味着，人民与市场主体的权利范围更大了，人民的自主性事实上也更强了。

（摘自《北京日报》）

学习“四个全面”中的战略思维

戴 旭

“四个全面”的提出标志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中国梦”则是全中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大多数华人的最大心愿，它包括了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发展三步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也包括了毛泽东当年讲过的“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说“近代中国史就是追寻中国梦的历史，而今人所做的，就是跑好接力赛中自己手中这一棒”。而“四个全面”就是“今人”对如何跑好这一棒的探索结果。“四个全面”之间本身并不是平行的关系，每一个“全面”都有其战略作用。这一点通过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能够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战略脉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中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全面深化改革”是“四个全

面”中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其主要任务是建立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以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中的保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依靠全面依法治国。它和“全面深化改革”是鸟之两翼，其目的都是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同的是，一个从制度层面，一个从法治层面，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改革必须以宪法法律为基准，深化改革就是要进一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而在一定层面上，改革要上路，法律也要先让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中的基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这是被近代中国史反复证明了的，也正在被现实所证明。“四个全面”涵盖了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及各个层面，可以说就是一张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四个全面”对于整个国家战略的全面推进具有关键性的重大意义。既是对

过去百年的历史承接，也铺展开未来百年的宏伟蓝图。随着“四个全面”的落实，中国发展将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而富强、民主、自由、公正等集各种美好期盼于一体的中国梦，也将变得触手可及。

（摘自《求是网》）

毛泽东与中国道路

陈 晋

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毛泽东那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基础性成就，“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赶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从不同角度揭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民所进行的探索奋斗，同今天我们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由此说明，改革

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绝不能互相否定，毛泽东与中国道路的关系不可分割。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不离开中国道路这个方向，才能更深切地体会他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做探索的内涵和价值；反过来，谈中国道路的探索和开创过程，不离开毛泽东那一代人积累的成果，才能更深切地体会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道路四个“走出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这个论断。毛泽东与中国道路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来，突出地反映在他领导党和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这是因为，道路的探索和选择，常常是和一系列重大决策联系在一起的，总是同总结和积累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也总是和理论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以理论探索为灵魂的。

（摘自《党的文献》）

理想信念的坚定与哲学话语权

侯惠勤

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中之重是理想信念的培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与此极不相配的是“官场信仰缺失”，坚定理想信念成为从严治党的第一难题。究其原因，不能不看到哲学话语权的严重丢失这一源头。事实上，理想信念和哲学世界观紧密相关。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在当前需要解决三

大难题：一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缺乏足够的经验依据的前提下，如何确立共产主义的科学根据？二是现实状况是“西强东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处于低潮，我们如何确立必胜信心？三是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问题，关键在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多年来西方意识形态反对所谓“宏大叙事”、力推所谓“细小叙事”的非意识形态化渗透，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解构危害极大。

（摘自《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中华美学精神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丁振海

中华美学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精髓正在于强调以艺术的载体和审美的方式彰显思想的、道德的力量。从中华美学中汲取向上向善的精神营养，培育发现美、感悟美、表现美的能力，是提振当代文艺的必要条

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生动活泼”、“栩栩如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相结合，坚持的正是“文质兼美”的美学标准，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特质所在。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古今中外

的文学史上都是最主要的两种创作方法。前者以对现实生活的精细描画取胜，后者以对理想世界的热烈幻想见长。但就本质来说，任何创作都包含着“现实”和“理想”两种元素，不应割裂开来或有所偏废。在中华美学思想史上，刘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和王国维“造境”、“写境”等提法，就颇有些“浪漫”与“现实”相结合的意味，对我们当前的文艺创作有借鉴的价值。

中国传统美学极为强调文品与人品的统一，这对于今天的作家、艺术家来说更为重要。只要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火热的生活中开阔胸襟、荡涤灵魂、汲取力量、志存高远，就一定能做到人品与文品的统一，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的不断涌现提供最可信赖的人格保证。

（摘自《人民日报》）

维护移动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宋丽丹

“移动网络”是指移动终端（如手机、平板电脑等）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合二为一，用户通过相关软件既可以随时接触海量信息，也可以随时发布信息。目前，在移动社交网络上传播的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主要有六大类别：一是以“揭秘”的方式，为汉奸地主卖国贼正名，同时抹黑人民英雄，企图直指党的意识形态“虚伪”。二是在为“民国热”推波助澜的同时，不停抹黑中国共产党。三是鼓吹“体制之恶”导致中国国民性“低劣”。四是编造虚假信息，企图煽动群众与党和政府对立。五是对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某些群体，如官员、教师、城管进行集体

“妖魔化”。六是利用突发事件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使其怀疑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政治信誉。

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首先要加强网络监管，掌握网络管理的“总开关”。其次，重视对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正面宣传。同时，要加强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面临危机的分析。我们要用铁一般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造成贫富差距、经济危机并最终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及趋势，从而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摘自《红旗文稿》）

警惕雷人台词背后的 反历史、去历史化倾向

王新荣

雷人台词背后传递的是一种历史观上的错误。它把客观真实的抗战历史变成了抗日科幻剧，不敢正视甚至蓄意无视历史真相，是一种丢失了历史本色的艺术投机，这其实就是一种反历史。“去历史化”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它将商业片中的“英雄救美”模式在抗日剧中进行简单的移植，将抗日剧俨然变成了披着抗日外衣的武侠、爱情、奇幻、枪战商业片，这样的抗日“神剧”只会让民众在娱乐的

洪流中变得不再敬畏历史。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是一段浴血奋战的历史，其间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3500多万生灵涂炭，代价之惨重，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创作者应继续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对历史和艺术心怀敬畏，在总结前人艺术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时代创新，最终实现作品艺术性与商品性的双赢。

（摘自《中国艺术报》）

中央再次对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的行为作严格规定，要在上海试点，拿出这方面的实招和细则，是从严治党“敢啃硬骨头”的重要表现

从严治党也得“敢啃硬骨头”

周锦尉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将完善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方面的规定让上海

“先行先试”。中央有关部门将给予支持，跟踪进展，总结经验，在试点基础上扩大试点、逐步全面推开。这是中央一项带有战略性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这是一项“啃硬骨头”的

任务。有关“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不准经商”方面的规定，党内早就定有，最早可以追溯到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接着1989年7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七件事的决定”，其中第二件事就是“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此后，党内在2001年、2010年又相继发出这方面的规矩。遗憾的是，某些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经商问题上，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变幻方式、屡禁屡犯。在已查处的各种“打虎拍蝇”的案件中，人们都可以看到贪官腐官背后，有着“贪内助”、“恶衙内”的身影。比如周永康案有周滨，徐才厚案有其妻女，令计划案有令的妻子加兄弟，刘铁男案则是“儿子前台收钱，老子后台办事”，看似腐官“各显神通”、“步步踏准”，然而“东窗事发”，“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而要了自己性命”，而且是“家庭塌方”！倘若说经济体制改革到了“深水区”，须“敢啃硬骨头”，那么，中央再次对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的行为作严格规定，要在上海试点，拿出这方面的实招和细则，是从严治党“敢啃硬骨头”的重要表现。

其次，这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一次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包括党建方面的“改革党的纪检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

的任务。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依法治国总目标时，要求形成由“五个体系”构成的“法治体系”，即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去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小康是发展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两个轮子，全面从严治党是保障，将四者联成一个全局性战略的实施过程。可以说，让上海“先行先试”的这项改革是党建课题，属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范畴，它与改革相关，又与全面依法治国相关联。由此，中央选择这个“点”，以此突破，是赢得事关“全盘”性胜利的一步重要棋子。

再次，这是“以小见大”，“以家风影响党风政风社风”的一次尝试。中国古训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国家，家风对一个人的素质养成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如果说，执政党党风影响着政风社风，那么，家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影响着“全身”，家风亦影响着党风政风社风。家风不是小事。试想，有一位时时处处盯住的、极力反对自己丈夫“伸手”的“贤内助”，丈夫也就难以成为贪官了。

最后，中央选择上海作为试点，是对上海，对上海干部队伍的高度信任。在改革开放方面，中央确定上海要做到“四个率先”，勇做“排头兵”，敢当“先行者”，十八大后又明确“自贸区”先行先试，获得经验后

向全国复制、推广。此后，司法体制改革又选上海试点。现在，“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的试点任务，又落到上海身上，正如市委书记韩正同志所指出的，“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上海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定决心、

勇于担当，把各项要求落实好，不辜负中央的期望”。我们深信，上海在改革开放上“先行先试”有成果，在从严治党方面，也一定会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摘自《上海支部生活》）

万隆精神的新时代内涵

陈 须 隆

60年前，包括中国、印尼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的政府首脑在印尼万隆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亚非国家共同倡导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形成了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

当时，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会议。他代表中国高举“求同存异”的旗帜，广泛开展工作，团结了很多朋友，有力促进了亚非各国的团结合作，为新中国外交奠定了基础。

60年后，约100个亚非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或代表出席了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纪念峰会，就促进亚非国家繁荣、安全与稳定达成广泛共识，通过了三个成果文件，并承诺将通过合作确保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得以落实。

习近平主席率团出席纪念峰会，并发表了《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他代表中国高举

“合作共赢”的旗帜，为万隆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为亚非国家团结合作指明新方向，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相比60年前，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突出特点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世界也还很不太平，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全球经济、金融和贸易经济体系不平衡，南北差距依然悬殊，亚非国家的主权安全、团结合作、共同发展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因此，弘扬“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时代和形势的必然要求。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势头更加明

显，加大合作、联合自强的基础更加扎实，前景更加广阔。亚非国家也更有意愿和能力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所以，这次“战略峰会”的主题确定为“加强南南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峰会表明，合作共赢已成为万隆精神的新时代主题。

今后，亚非国家本着万隆精神，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力争实现以下三个层面的合作共赢。

首先是亚非国家的合作共赢。这要通过重振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亚非合作来实现。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峰会上所指出的，亚非国家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接发展战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工业、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打造绿色能源、环保、电子商务等合作新亮点，把亚非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互助力；还要深化区域和跨区域合作，用好现有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适时建立新的合作平台，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亚非合作新格局。

本次纪念峰会，亚非国家就亚非实现合作共赢达成若干重要共识，主要包括：同意在亚非两地区成立维和中心网络；共同谴责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促进不同文化和宗教间的对话；大力培育贸易和投资作为增长引擎；努力建立促进增长且包容的、更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创造增长、就业和投资机会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承认海洋问题的重要性

和印度洋战略地位对推进亚非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把海洋合作作为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支柱之一；帮助巴勒斯坦加强人力资源和机构建设。

继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赢。这要通过加强南南合作来实现。亚非国家在深化亚非合作的同时，要加强同拉美、南太及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扩大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对话交流，密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壮大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力量。

习近平主席为加强南南合作指明了方向。一是加强机制建设。为此，要发挥好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机制的作用，建设好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金砖国家等合作平台，推动发展中国家区域组织开展对话交流，并探讨建立南南合作新架构。二是要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为此，需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引导2015年后发展议程谈判，重点关注解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进而是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这要通过推进南北合作来实现。对此，习近平主席提供了重要观点、崭新视角和建设性主张。他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南北关系，并强调，南北关系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世界和平稳定的全局性问题。他提出了推进南北合作的三大主张：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是开展南北合作的政治基

础；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缩小南北差距，这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观念，致力于建设命运共同体，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新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在当今世界，万隆精神仍然具有

强大生命力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并绽放出“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时代光彩，成为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助推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催化剂、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孵化器。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8个“关键词”读懂上海司法体制改革

1、可复制、可推广

试点要在三个方面着力实现创新：在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上，探索实行“员额制”；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上，探索完善司法责任制；在司法机关层级管理上，探索实施省以下人财物统管。

2、法官、检察官“员额制”

将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以及行政管理人员三类。在改革中，上海确定了三类人员分别占队伍总数33%、52%、15%的员额比例。

3、法官、检察官助理

2014年9月5日，上海首批，也是新中国首批289名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接受任命。而从现在起，上海全市法院、检察院都将陆续任命法官/检察官助理。他们是法官、检察官的助手，也是未来法官、检察官的“蓄水池”。

4、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

成立于2014年12月13日的遴选（惩戒）委员会，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中的新鲜事物。随着改革在上海全市推开，遴选工作将步入定期化、常态化运作轨道。

5、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由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正在落到实处。

6、院长/检察长的“权力清单”

清单管理制度，已经在各家试点单位普遍实施，并将推广到上海全市所有司法机关。检察长的职责从原来的50多项减少到17项。

7、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

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的设立，有利于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防止司法“地方化”倾向，从而提升司法公信力。

8、人财物省以下统管

当前，上海正在探索实施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省以下统管制。

（摘自《支部生活》）

名词解释

1、“情怀”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近日，河南一位女教师这封“最有情怀，没有之一”的“辞职申请”，引来无数人共鸣。人民日报评论称，看起来文艺腔十足的表达，背后是时代的发展、文化的演进，诠释着社会心理结构的变迁：摆脱现实生活的患得患失，拥抱一个更广阔也更精彩的世界。即便这个世界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但谁的心中没有激荡过一个远方？一个正常的社会，也应该是一个有活力有机会的社会，当人生出彩的舞台越来越广阔，也更加刺激了“出走”的渴望。

2、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4月20日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一致同意将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中巴关系是“好邻居、好伙伴、好兄弟”，而“宁舍金子，不舍中巴友谊”是巴基斯坦常用来表达对中巴友谊珍视的一句名言。正是这样的一对“铁哥们儿”，现在正式上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为更高层次的友好关系。

3、博傻理论：博傻理论认为，股票市场上的一些投资者根本就不在

乎股票的理论价格和内在价值，他们购入股票的原因，只是因为相信将来会有更傻的人以更高的价格从他们手中接过“烫手山芋”。专家分析称，投资者对未来判断的分析不一致，有人过于乐观估计，也总有人趋向悲观，有人过早采取行动，而也有人行动迟缓，这些判断的差异，使整体行为出现差异，激发市场自身的激励系统，导致博傻现象的出现。

4、“葛朗台式”贪官：上一次公开露面还是“穿衣朴素”、“一日三餐馒头稀饭”，再次从报纸上看到他却是“家中发现上亿元现金”、“藏了37公斤黄金”，媒体总结称，中央“打虎拍蝇”力度越来越大，“葛朗台式”贪官屡见不鲜。

5、悬浮剧：某些脱离中国现实的现实题材剧，剧中的事件、情感没有依据可循。尤其是当中的豪门人物，活像空降而来，完全找不到当今真实生活的对应。媒体评论称，这些剧集桥段高度雷同、千篇一律，都是集失忆、毁容、复仇、绑架、商业竞争、身世之谜等等俗套桥段于一身，再用近似韩剧的服饰、化妆、道具去包装，这种极度接近韩剧的人物、关系和行为方式，既悬浮又狗血，完全不接地气。